

2006

(第1卷)

公共管理论坛

GONGGONG GUANLI LUNTAN

主 编 王义保

副主编 贺 伟 施向峰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2006

(第1卷)

公共管理论坛

主 编 王义保
副主编 贺 伟 施向峰

公共管理论坛
第1卷第1期
2006年1月
1-12页
王义保 贺伟 施向峰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公共管理论坛
第1卷第1期
2006年1月
1-12页
王义保 贺伟 施向峰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共管理论坛. 2006 第 1 卷/王义保主编. —徐州: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2006. 10
ISBN 7 - 81107 - 307 - 2

I. 公… II. 王… III. 公共管理—文集
IV. D03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4333 号

书 名 公共管理论坛. 2006 第 1 卷
主 编 王义保
责任编辑 齐 畅
出版发行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江苏省徐州市中国矿业大学内 邮政编码 221008)
网 址 <http://www.cumtp.com> E-mail: cumtpvip@cumtp.com
排 版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排版中心
印 刷 徐州中矿大印发科技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本册印张 16 本册字数 399 千字
版次印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总 定 价 100.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公共管理论坛》编委会

委员会

主 席 池忠军 郑易平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 锋 王义保 史云秋 许 超

刘雪凤 周云圣 贺 伟 赵入坤

施向峰

编辑部

主 编 王义保

副主编 贺 伟 施向峰

成 员 霍明帅 王 科 居 涛

电 话 0516—83591468

E-mail yydy1124@163.com

政治与行政

- 1 刘 源/简述列宁、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思想
- 6 钱士伦 李志峰/论潘恩的市民社会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 11 吕 然/浅谈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三组矛盾
- 15 丁 菊 徐文飞/论公共决策中公众参与效力机制的建构
- 19 郑晓坡/浅谈公共政策评估体系的建构
- 23 郭燕杰/当前我国问责制建设理路探析
- 26 于忠华 金 蕊/完善人大专门委员会体制的途径初探
- 30 林 茂/对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几点思考
- 33 姚 涛/适度政府规模:我国政府机构改革浅析
- 38 杨贤璋/对政府管理理念的思考
- 41 罗大蒙/论善治在我国的可行性
- 45 杨安永/我国公务员制度的改革与创新
- 48 段志英/当代中国政府改革趋势探析
——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 53 李金明/我国行政文化错位及对策分析
- 58 刘步会/关于人权与主权及其关系的思考
- 61 柳希猛/西方“公民不服从”问题初探
- 65 王晓庆/浅论当代中国的“公民不服从”
- 69 孟凡昌/加强与完善我国行政监察制度的思考
- 73 李登明/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政府绩效评估途径
- 78 雷丽霞 郑易平/浅析苏联政府体制的弊端及启示
- 82 王兴周/美国对台关系的现实选择
- 86 郑金秀/论中国和平崛起中的“软力量”建设
- 90 杨静贤/论中国古代专制权力下的士
- 94 崔亚宁 郑易平/浅析当代农村社会分化现状
- 98 郝 文/论腐败的制度困境与治理途径

法律与道德

- 102 王 莲 王义保/矿业安全生产问题的行政伦理分析
- 107 施向峰/审视与建构:当代中国宪法至上观研究
- 111 汪曼乔 陈 嘉/刑事诉讼中建立缺席判决制度之思考
- 115 张宏亮/论依法治国是我国民主建设的基本途径
- 119 斯琴格日乐/论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道德观
- 124 王 超/以知识产权为视角对探矿权性质的思考
- 129 何 鑫/我国公民意识缺失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建构/刘志友	134
浅析文明冲突论/席从文	138
当代世界人文学者思考的历史地域局限之可能性/赵庆庆	143
新时期西方意识形态理论与中国的外交政策/胡 蓓	147
谈大众传播活动中的法律侵犯问题/齐 畅	152
经济与管理	
煤矿安全规制中的信息不完全问题分析/周云圣 贺 伟	155
我国城市土地管理中的问题与对策/林岩磊	159
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合作伙伴关系探析/霍明帅	163
从经济学角度看“人力资源管理外包”/李淑芬	167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定位分析/冀朋元 王 浩	171
淮海经济区一体化进程中的政府间关系研究/刘永利 许 超	176
论我国企业管理的困境及解决方法/王 科	180
高校后勤集团的 MIS 设计	
——以中国矿业大学后勤集团为例/王佩佩	184
论我国国企改革的体制困境与出路/吴稳稳	188
政府在环渤海经济圈融合中的作用/夏龙江	192
论政府在旅游管理中的作为	
——以徐州市为例/罗 希	196
浅议城市拆迁的困境及出路/张舒航	201
浅论城市规划的权威性/祝广庆	204
浅议“经济人”在行政伦理中的境遇/曹洪彬 周云圣	208
出版社编务管理的职能定位与流程创新/崔永春	212
教育与科技	
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对青年教育的诉求/王 翠	215
管理性评价模式对教师评价的影响/吴建华	219
高校教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构建与创新/刘圣汉 赵保全	223
论汉代士大夫家训中的修身观念/阎续瑞 贾金玲	228
和谐科学观的历史原因分析	
——基于对近现代科学观的反思/王庆鸾 于衍平	233
对生命科学研究方式的思考	
——从物理学方式到生命科学特有方式的转变/高 洁 周 岩	238
哲学视野下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丰娴静	241
信息时代与终身教育/刘怀忠	245
论科学的目的/封 寒 周 岩	248

简述列宁、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思想

刘 源*

如何在夺取政权后建设社会主义,是摆在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面前的艰巨任务。统观国际共运历程,一方面,不少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一味地囿于马克思恩格斯早年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不顾及本国的实际情况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提出社会主义伟大构想时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差异,一切从本本出发,用马克思恩格斯天才的设想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要求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全部遵照,试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正面进攻、迅速取胜,结果事与愿违,把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带入了一个不切实际的“直接过渡”、“穷过渡”的冒进状态,造成了巨大损失,受到了深刻教训。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阵营里苏联的惟我独尊及其建设模式的强行推广,致使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建设事业出现万马齐喑的僵化局面,缺乏生机和活力。此外,在中国,还由于社会主义国家领导者受在长期而又惨烈的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阶级斗争的惯性意识影响,在建设与发展关系问题的处理上出现失误,强调以斗争促进生产和建设,以阶级斗争为纲,结果致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陷入徘徊甚至倒退状态。

但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有两个伟大人物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思想与实践是为世人所景仰的,他们就是俄国伟大的革命和建设导师列宁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因为他们把握住了俄国和中国比较落后的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而不惟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提出了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通向社会主义的方案,舍弃从正面进攻迅速取胜的方案,从而在新的条件下给马克思主义注入了新鲜血液,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大地推进了一步,使其达到了新的高度。他们以超人的创新胆魄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力排众难,实事求是,开创了各具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的新道路,打开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宝贵经验。

一、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现实相结合,探索本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从他们所处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出发,构想出宏伟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蓝图,提出了从资本主义到完全社会主义的过渡期是短暂的以及欧洲主要国家同时胜利等观点,这就给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取得胜利的落后国家的领导者造成了一定的错觉,提出了新的实践考验。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就着力考虑生产力落后的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多数的新生政权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其探索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十月革命胜利到1918年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第一阶段的时间虽然只有半年多,但列宁却很冷静地指出要反对“左”派幼稚病,不能搞

* 刘 源,女,中国矿业大学文学与法政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

直接过渡,他还批驳了布尔什维克想用暴力实施社会主义的言论,提出了实施“国家资本主义”的设想。第二阶段从1918年下半年到1921年春季,这一阶段是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时期。为了粉碎外国帝国主义对新政权的颠覆阴谋并平息国内反革命武装叛乱,列宁领导下的苏俄在全国实行了以余粮征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逐步建立了一个由国家实行高度集中领导,用行政手段组织生产和分配,基本上不要商品和货币的经济体制。第三阶段被称为“新经济政策”阶段,从1921年3月开始至1924年1月列宁逝世。在这一阶段,列宁首先总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失败的教训,坦率地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在不断实践和探索中得出了落后国家不能直接过渡的结论,提出了符合俄国国情的新经济政策。为了从工农之间的军事联盟顺利过渡到正常的经济联盟,列宁从1920年最后几个月起就开始考虑改变经济政策的问题,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先后写了《农民问题提纲初稿》、《论粮食税》等重要著作,认真分析了俄国经济建设中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情况,提出建立带有小农占人口多数所造成的种种特点的社会主义的目标。这种新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使俄国的生产关系重新符合了落后生产力的要求,特别是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有效地巩固了年轻的苏维埃政权,为以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中国,由于党内“左”的错误,经历了20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广大群众的热情丧失殆尽,“大跃进”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后果让人们心有余悸,长期以来形成的教条、僵化的思想禁锢着人们的心灵。1978年,一场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狂飙突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中国揭开了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新篇章。邓小平以其高超的政治智慧驾驶起中国的航船,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苦探索。他明确指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邓小平对中国如何从贫穷落后、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状况过渡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的探索,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并最终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治国方针。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表,这是中国改革理论创新和局部实验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邓小平力排众议,纠正错误,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第二阶段是从1984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到1988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议》,是以城市为中心全面改革探索的阶段。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的改革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科技、教育及其他社会生活领域。第三阶段是从1988年9月至1992年初,是中国改革开放总结经验、整顿和调整的阶段,在实践上治理整顿经济和社会环境,在理论上总结经验教训,为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作准备。第四阶段是从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到1996年邓小平逝世,是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内容的综合改革阶段。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是一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一轮建设的宣传书,为曾一度陷入徘徊的社会主义事业注入了强大的活力,澄清了人们的观念,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他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判断改革开放成败得失标准等问题的阐述使人们豁然开朗,以他为核心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在新时期推进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指导思想。在这一阶段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集体经济、国有企业在我国竞相发展,社会经济生活空前繁荣,

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稳定前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抓住根本,放眼全局,从严治党,努力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

作为杰出的政治家、革命家,列宁和邓小平不同于其他领袖人物之处就在于能及时从错误中警醒过来,不拘陈法,并具有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卓越才干。他们虽然处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但是他们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怎样开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问题上却有着相当一致的见解。他们分别从各自的国情出发,抓住根本,放眼全局,从严治党,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而不断进行理论探索和建设实践,为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1. 抓住生产力根本,努力建设富强的社会主义

新经济政策正式实行以后,列宁对苏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了再思考。他首先认识到社会主义要真正实现,大工业才是其惟一可能的物质基础,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必须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新经济政策发展小工业和农业最终也是为了恢复和发展大工业。他指出:开发资源,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和惟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业,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业国家来说就更是如此。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列宁一贯强调只有创造出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才是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保证,社会主义只有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只靠先进的政治制度是不足以战胜资本主义的,必须有先进的生产力作为根本保证。共产主义也必然是先进的政治制度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产物。为此,列宁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理论。他认为发展大工业,必须勇于利用、吸收和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并且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否则,我们就不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他还指出,在大力发展本国的物质技术力量的同时,必须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为我所用,要得到“设备精良的现代资本主义技术的帮助”。列宁在逝世前一年十分冷静地告诫后人:在生产率较低的水平上,社会主义是难以持久的,发展生产力不仅是经济上的任务,也是拯救、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任务。

在发展生产力问题上,邓小平同样表现出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在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和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后,中国迅速走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邓小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他明确指出: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在发展生产力途径的问题上,邓小平首先主张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把生产力从僵化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从实际出发,建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的经济制度。其次,实行对外开放,大力吸收国外先进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为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生产力服务。因此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较之改革前有了显著提高。

2. 放眼建设全局,加强教育事业,努力建设文明的社会主义

重视对全体人民进行文化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是列宁与邓小平的又一共同之处。列宁晚年(1922~1924)在对苏俄社会主义建设再思考时,深刻认识到文化教育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十分明确地指出:“在一个文盲的国家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

会的。”在对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上,列宁强调只有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才能有效地改造落后的工农业,才能使人民群众摆脱贫困愚昧、克服旧习惯势力的影响,才能保证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解放。因此,要把教育这个任务提到首位。在教育目标认识上,列宁特别强调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要培养具有共产主义觉悟和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一代人。在对待教育工作者问题上,列宁指出要注意提高人民教师的地位和待遇,使他们成为苏维埃制度的坚定支柱。他说:应当把我国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而最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除了重视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教育外,列宁还进一步指出要对广大人民进行各种层次的思想道德教育。首先,列宁指出不论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还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都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不能有丝毫的放松和懈怠。其次,列宁提出了“区别对待”的道德教育原则。列宁指出,在过渡时期、在建成共产主义物质基础之前,对广大农民和居民是不宜进行纯粹的和狭义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而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则必须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使他们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由于“文革”的影响,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出现了倒退。现代化建设人才奇缺,严重制约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邓小平复出以后,深刻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到从科学和教育着手。”他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高度、从经济和科技、教育的辩证关系中,看到了教育的基础作用,提出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著名论断,发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伟大号召。他指出教育的根本目标是要培养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教育要成为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基础,既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还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要把德育、智育、体育等完善结合起来,真正培养出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有社会主义高尚道德、有深厚的文化素养、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的社会主义新人,为建设文明的社会主义作出贡献。

3. 从严治党,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建设民主的社会主义

党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成败的关键,必须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这是列宁和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实践的又一重要共识。列宁晚年十分注重加强党内监督和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主张严格治党,惩治党内的不正之风,要求“法庭对共产党员的惩处严于非党员”。与此同时,列宁领导建立了党内监督机构,在全党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切实提高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就他自己而言,总是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遵守党的纪律;他善于开展党内斗争,既坚持原则依靠广大党员群众反对和削弱了党内存在的无政府主义、左倾教条主义、民族主义等错误思想,又解决了在路线政策上的分歧,禁止了派别活动,没有让党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之中;他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从未在党内进行过过火的斗争,伤害同志,始终保持了党的勃勃生机。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邓小平也特别关注党的建设,全面系统而又深刻地提出了从严治党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的理论。1979年改革伊始,邓小平就敲响了党风问题的警钟,他深刻指出:“现在有少数人就是做官当老爷,有些事情实在不像话,脱离群众,上行下效,把社会风气也带坏了。”此后,邓小平领导全党开展了一系列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建设的活动。1980年,他提出了“整顿”党组织和“党员要合格”的思想。1982年,他提出,对问题严重的党员,必须开除党籍、军籍及公职。1983年,就廉洁党风、惩治腐败问题,他指出:“要雷厉风行

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为了能从根本上实现从严治党,提高党的群众威信和战斗能力,邓小平指出,首先是必须加强司法制度和党的制度的建设,建立健全人民群众监督制度和党内监督制度。其次是必须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全党的组织性、纪律性”。最后是必须全面加强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建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生活制度。他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深刻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总之,邓小平从严治党的思想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理论为促进我国民主的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和实践意义。

纵观十月革命后苏俄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建设,考察列宁和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与实践,我们不能不敬佩这两位伟大领袖的非凡的政治智慧和卓越的治国之道。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国情的结合,开创了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创立了列宁主义;而邓小平则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获得了新发展,达到了新高度,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指南。

参考文献

- [1]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列宁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3]列宁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4]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5]邓小平文选第2、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论潘恩的市民社会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钱士伦* 李志峰*

托马斯·潘恩(1737~1809)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启蒙思想家、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是一个反对封建制度和迷信的坚定斗士,他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也试图勇敢地参加英国革命,是曾经参与三个国家革命事业的一个平民。他在政治思想上没有鸿篇巨帖;在他众多的政论文中,潘恩面对美国广大民众,运用浅显流畅的语言,将十七、十八世纪欧洲流行的革命理论作为常识宣讲,这使他的思想主张富有启迪性和感染力,极大地鼓舞了美国人民的抗英斗争,就连当时的华盛顿也颇有感触地认为《常识》在很多人心中,包括他本人在内,都引起了“巨大变化”。当时华盛顿的士兵,每人手中都有一本发黄的《常识》,难怪美国在2003年举行的“改变美国的20本书”活动中,潘恩的《常识》名列第一。笔者就潘恩的市民社会思想作一整理探讨,阐述其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及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一、潘恩市民社会思想综述

“市民社会”一词,是由英文的“Civil Society”一词翻译来的,其并不是近代的专利,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政治学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书中,“Civil Society”即市民社会,指的是一种“城邦”,即城邦政治共同体。公元1世纪,古罗马政治哲学的最高代表西塞罗明确了市民社会的概念,他指出:市民社会“不仅指单个国家,而且也指业已发达到出现城市的文明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况”。公元17世纪至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为了反对专制王权,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再次受到重视。在一些契约思想家,如洛克、卢梭及稍后的康德等人那里,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乃是同义词,它指的是人类的文明状态,与其相对应的不是政治国家,而是人类的自然状态或自然社会。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在中世纪及中世纪以前包括一些契约论者,他们并没有严格区分“市民社会”、“政治国家”与“文明社会”,而是在这三重意义上使用“市民社会”一词。

“市民社会”真正独立于“政治国家”之外,是在资本主义时期。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近代意义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并呼吁“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的是美国著名学者托马斯·潘恩,他第一次把社会与政府置于同等的地位,并且褒扬社会,而贬低政府。潘恩指出:“市民社会”和“国家”不是一回事,它们是两个截然相反的东西,有着不同的起源、不同的目的。市民社会是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相互合作而结成的社会经济联合体,它用积极的方式增进人类的利益;政治国家则是人们为了避免邪恶和混乱,以法律保护人们的自由和安全而结成的组织,它用消极的方式增进人类的福利。潘恩在《常识》中开宗明义,“有些作者把社会

* 钱士伦,男,中共淮安市清浦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 李志峰,男,中国矿业大学文学与法政学院教师。

和政府混为一谈,弄得它们彼此没有多少区别,甚或完全没有区别;而实际上它们不但不是一回事,而且有不同的起源。社会是由我们的欲望所产生的,政府是由我们的邪恶所产生的,前者使我们一体同心,从而积极地增进我们的幸福,后者制止我们的恶行,从而消极地增进我们的幸福。一个是鼓励交往,另一个是制造差别。前面的一个是奖励者,后面的一个是惩罚者。”^①在稍后的《人权论》中,潘恩还深刻地看到了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逆反关系:“市民社会越完善发达,政治国家就越无足轻重。在真正的民主制中,政治国家至多不过是一种必要的邪恶。”潘恩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看做是历史的进步。潘恩正确认识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自由放任”政策的实施,财产关系乃至整个经济上的关系日益脱离政治国家的控制,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是必然的,是历史的进步,因为市民社会是人们根据自己的利益而自愿结成的社会联合体,它“积极地增进人们的幸福”。正是潘恩这种科学理性的态度,使《常识》一书风靡整个北美大陆,并成功征服欧洲,为后来边沁、密尔等的自由主义市民社会理论打下了基础。

潘恩不仅论述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还在其著作《常识》与《人权论》中探讨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起源及目的,并提出了有名的市民社会对抗国家的思想,这也是潘恩市民社会理论中最为闪光的一点。潘恩《常识》的第一篇就是泛论政权的起源和目的,他和众多的社会契约论者一样,用历史的眼光对国家与社会的起源作了探讨。潘恩将市民社会界定为由“自然状态”转换而来,无需法律和政府约束的自由联合体。而国家与政府是由于人们德行的软弱无力而必须采取的治理世界的形式,人们建立政府是为了获得安全与自由。因此,好的政府的宗旨应当是保障人民的安全和增进人民的幸福。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潘恩提出了市民社会对抗国家的思想。关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潘恩认为它们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不可忽视、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两种力量,是矛盾的统一体。但是在对待二者的态度上,他褒扬市民社会,贬低政治国家,尤其是当时令人憎恶的君主政体。他指出,君主政体只会招致人类的苦难,是战争的根源。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点,他指出:“荷兰没有国王,近百年来已经比欧洲任何君主政体的国家安享了更多的和平。”^②本应该为人类增进幸福的政治国家,有时会堕落成一个“不能容忍的祸害”。因而,潘恩向往市民社会,因为它和谐美好;鞭笞政府和国家,因为它邪恶混乱。一个越多管理自己的事务且越少需要政府来处理的社会,就是最完美的市民社会。那么如何才能实现最完美的市民社会呢?潘恩在《人权论》中提出:“市民社会与国家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市民社会愈完善,对国家的需求就愈小。”即用市民社会与国家对抗。

潘恩是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最早将社会与国家加以区分的思想家,他提出的“市民社会对抗国家”的理论成为“近代西欧的思想史和政治史的主旋律”。他关于“政府是免不了的祸害”和“市民社会优于国家”的观点,对19世纪自由主义国家观有重大影响;就是在今天看来,这一思想也不为过时,对我们的现代社会也有很大的启示。因此,《潘恩传记》的作者约翰·基恩坚决要人们把潘恩看做同时代的人。

① 托马斯·潘恩:《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页。

② 托马斯·潘恩:《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0页。

二、潘恩的市民社会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一) 市民社会的存在是实现政治民主的一个必要条件。

毫无疑问,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发展,是一个社会政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和根本标志。尽管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对民主的内容及具体的实现形式有不同的理解,但对民主本身的价值是予以一致肯定的。从五四以来,民主一直是很多志士仁人的梦想。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形势下,任何民族、国家最终都会卷入民主化的进程中。潘恩虽然没有像后来的美国学者托克维尔一样,明确地指出市民社会与民主的关系,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的思想和勇气是难能可贵的。那么既然市民社会对政治民主建设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它在民主化的进程中究竟能够发挥哪些作用呢?换言之,市民社会的民主建设功能如何体现呢?我们可以作如下的总结:

1. 监督和制约国家权力。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阿克顿勋爵有句至理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当代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指出,市民社会“制约国家权力,从而为实现社会对国家的控制以及作为这种控制的最有效方式的民主制度提供了基础”。当市民社会脱胎于政治国家时,就天然地走上了与政治国家对抗的道路。市民社会组织将分散的个人资源和能量聚集在一起,使民间零散的呼声转变为团体的诉求,从而对国家权力结构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使之必须对公众负责,受公众监督。

2. 转化政治文化,培养民主精神。政治文化是政治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主的政治文化能够维护和促进民主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公民政治知识贫乏、被动冷漠,是不可能建立起强有力的民主政治的。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和沃巴在分析政治文化对民主政治的支撑作用时强调:“熟练的、参与的、理性的、主动的公民更多地存在于成功的民主国家。”“一个稳定的、有效的民主政府的发展,不仅仅依赖于政府和政治的结构,更依赖于人们对政治程序的取向、依赖于政治文化。除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撑一个民主系统,不然这个系统成功的机会是渺茫的。”市民社会在刺激政治参与、增强民主制度下公民的民主技术效能、培养提高公民的民主权利与意识、转化传统政治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公民自愿参加各种民间社团活动,乃是民主实践和文化的根基,也是经济活力的源泉之一。托克维尔认为,这种志愿性的团体是免费的民主大学,它使所有成员均可从中学到团体生活的理论,并培养人们在更高层次、更大规模上参与合作的社会资本。

3. 促进利益的多元表达。市民社会的特征是多元的社会集团(包括多重独立的社会组织),多元的利益,多元的价值观,以及在这个基础上的自我管理。因此,市民社会促进民主的又一种方式是:它为公民的利益表达集中提供了政党之外的多种渠道。对于那些传统上受到排斥的社会集团,如妇女和其他少数民族,接近权力显得尤为重要。只有通过下层的持续压力,才能不断地推进政治和社会的平等,从而提高民主政治的质量和合理性。拉里·戴蒙德对此总结道:“一个充满活力的市民社会不但提高了民主政治的责任能力,而且提高了民主政治的代表性和活力。”

4.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导致的权力分立为政治结构分化提供了前提条件。在传统的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系中,即使在结构上建立了各级各类的政治行政部门也只是形式上的,其并不具有适应现代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政治与行政功能。因为当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或几个人手中的时候,权力的运行仅仅取决于权力拥有者的私人利益和个人意志。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必然会干扰甚至主宰具体行政部门的事务,使各级行政机构首领包括机构

本身都变成实现权力意志的工具。这就严重制约了政治效率的提高,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权力分立是政治结构分化和政治功能专门化、自主化的前提条件。只有在权力分立并相互制约的情况下,各级政治行政部门才能独立自主地处理自身权限范围内的事务而不受强力的非法干预,由此才能促进政府效能的提高。

(二)现代市民社会的运转是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相分离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就意味着市民社会自身可以从内部建立起必要的秩序,而不必仰仗国家运用强制力量从外部去建立它。

潘恩曾在《人权论》中指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市民社会愈完善,对国家的需求就愈小。”可见,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立的,市民社会不同于国家,它不具有强制性。只有在市民社会的成员都能够尊重他人的利益和权利才能赢得他人对自己的利益和权利的尊重,只有人人遵守活动规则(包括法律规范)才能保证各项活动的正常进行,从而使每个人的利益都得以实现。启蒙思想家所说的理性主义精神、自由主义者所说的合理的利己主义原则和黑格尔所说的普遍主义意识,正是这种思想或道德境界。这个过程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只有在商品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与完善的情况下才能慢慢形成,而不能运用国家的强制权力从外部建立。退一步说,即使能建成,这个市民社会也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它只能是国家权力的附庸,而这往往容易导致国家主义倾向。换句话说,现代市民社会的正常运转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正是其成员的道德觉悟和道德自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市民社会的雏形已经显现并不断壮大发展,这时我们的政府切不可有权力的介入,政府要做的就是为市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个好的政治环境,让其蓬勃发展。

(三)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相互关系角度来研究市民社会问题仍然是大有可为的。潘恩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确并呼吁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并认为市民社会与国家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因此,只有以政治国家为参照系去研究市民社会问题才会富有成果。现代市民社会与国家分别是两大生活领域(政治生活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的代表。政治国家要维护普遍的公共利益,控制市民社会中的利益冲突和斗争,就必须干预市民社会的内部事务,起平衡和调节的作用。对于市民社会来说,问题不是要不要国家干预,而是要确定国家干预的具体方式、内容和限度;同样,对于国家来说,问题不在于是否保留市民社会诸要素的独立性,而是要为它们的独立性确定一个合理的限度。只有在坚持两点论的基础上去研究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诸要素的关系(例如国家与个人、国家与社团、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共同体的关系等),才会得出合理的结论。

三、结语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始终是人们十分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在前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并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在政治上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是重合的,人们看不到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到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要求政府对私有财产以及建立在私有财产之上的整个经济生活实行“自由放任”。这样,财产关系乃至整个经济生活便日益摆脱了政治国家的直接控制,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的界限变得明确起来,经济上的等级不再与政治上的等级完全一致,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在现象上明显分离出来;以这种分离为前提,现代市民社会理论便产生了。

托马斯·潘恩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确肯定并呼吁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他明确地指出市民社会与国家是有区别的。市民社会是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相互合作而结成的社会经济联合体,它用积极的方式增进人类的利益;政治国家则是人们为了避免邪恶和混乱,以法律保护人们的自由和安全而结成的组织,它用消极的方式增进人类的幸福。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是对立的,市民社会越完善发达,政治国家越无足轻重,在真正的民主制中,政治国家至多不过是一种必要的邪恶。在潘恩的影响下,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为大多数的政治思想家所承认,并成为近代政治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政治思想家们围绕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相互关系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形成了现代政治思想中的几大流派:自由主义、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这三大流派围绕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不断地争论,进一步丰富了市民社会理论,产生了像托克维尔、黑格尔和马克思等市民社会理论大家,但这并不标志着市民社会理论的终结。到了现代,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形形色色的市民社会思想又在各国兴起,凸现了一股全球性的“市民社会”思潮。在中国,市民社会理论也一时成为政治学讨论的热门话题,但这一概念本质上是“西式”的,我们如何理解这一概念,如何才能使市民社会理论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服务就显得十分急迫。这就需要我们广大的政治理论工作者不断研究西方理论家的成果,汲取精华,剔除糟粕,使市民社会理论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产生有益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托马斯·潘恩.潘恩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 [2]孔德元.政治社会学导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3]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2
- [4]梅丽莎·莱恩.汤姆·潘恩和市民社会.闰月梅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7(3)

浅谈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三组矛盾

吕 然*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生活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正值高潮的时代,他目睹了斯图亚特王朝的反动统治、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斯图亚特查理二世的复辟,他曾为斯图亚特王朝卖力,又试图服从克伦威尔新政权。培根提出人是自然的产物,是构成世界的一部分,霍布斯则据此提出了人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霍布斯将近代自然科学成果和前人的思想与他的政治思想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他的国家学说。霍布斯的一生都是在颠沛流离和动荡不安中度过的。所以,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他个人的生活经历都注定了其政治思想的矛盾性。

一、霍布斯国家学说的理论根基

(一)自然状态

霍布斯认为感觉是物质实体的外界运动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人形成内部运动的结果,它只是各种不同的运动带给人们的幻象,人们对于喜爱的、对自己有利的感觉往往会追求,而对于那些痛苦的、厌恶的感觉则选择逃避。人总是想要竭力保全自己的生命,对于个体的人来说,维护生命是他的欲望、准则、目标和终极价值。自然权利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因此也不难理解人类是天生利己、趋利避害的。在自然状态中,保全生命是最大的善,自然权利得到满足就是公正。

人们根据自我保存的原则,在自然权利的驱使下,不断地追逐私利。人的欲望致使他们想尽一切方法去争取最大的利益和安全。每个人都可能因为欲望而与其他人发生纠纷或争执;每个人都可能因为保全自己而杀掉他人;每个人为获得最大的善,必须占有一切,甚至是其他人的追逐自然权利的权力。由自然状态引起的战争并不是一时一地的妥协之计,人人自危的战争状态便不再能给人们带来任何好处。超脱这种战争状态,霍布斯认为要靠人们的激情和理性。“使人们倾向于和平的激情是对死亡的畏惧”,而理性的一般法则为“每一个人只要有获得和平的希望,就应当力求和平”。人们的理性要求摆脱和完结自然状态就成为必然。自然法是由人的理性所发现的进行合理的自我保护的基本法则,理性要求人们寻求和平、信守和平,结束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实现和平的惟一途径就是每个人都放弃战争的根源——自己占有的一切权力,通过契约,把它交给一个能代表所有人意志的人格。

(二)国家的建立及运转

* 吕 然(1984~),女,吉林省长春市人,研究方向为西方政治思想与行政制度。